

[学苑话题]

10

辛德勇 著

困学书城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12

〔学苑话题〕

辛德勇 著

困学书城

C52

X50P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学书城/辛德勇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9. 12
(学苑话题)
ISBN 978 - 7 - 108 - 03234 - 8

I. 困... II. 辛... III. 文史 - 中国 - 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5607 号

责任编辑 朱竞梅
封扉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 数 247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自序

这是我关于读书与藏书的第四本文集。寒往暑来，又是一年过去。去年的今天，编辑好上一本文集的时候，我在序言里讲，恐怕至死也不会停止搜集和品味心爱的书籍。再转过一岁，就要进入孔子所说知天命之年，已经清晰触及生命旅途的一大界限，看人，看世界，都有了不同的感觉，想尽可能减除一些桎梏和负担。阅读和品味书籍，一时还很难割舍，但在这一年里，却是很干脆地超离了对搜求旧书的耽溺。

汇编在这里的文章，大多是一年来的新作，也有一部分过去发表的东西。除了谈藏书与读书的心得和感想之外，里面有几篇文章，是应人之邀所撰书序，另外还有几篇书评。收入这些文章，是因为文中写有我对相关文献或学术问题的看法，而不只是出于应酬的浮泛空话。

清代学者彭兆荪，在一首警醒自己不要随俗刊刻诗集的诗里曾经写道：“不求元晏先生序，不要东林佛院交，只与同心二三子，一灯风雨省传抄。”前贤自我约束如此，吾辈动辄灾梨祸枣，实在惭愧。不过，如同甘亭先生在同一组诗里所说：“一检绡囊一搔首，过来无限好华年。”扭头回望在风雨青灯中流逝的年华，不拘贤愚，都难免心生感慨。编成这本文集，主要是想清理这一年的读书生活，重看一眼度过的日子。还不知道是否有出版社来印它，但这并不重要。

2008年6月9日记

目 录

001 自序

念书买书

- 005 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 015 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 027 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 041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品书评书

- 057 默室求深，备其宣导
- 072 聚遗刻以还正史传
- 085 从汧于九州河山
- 095 旧京新黄图
- 104 徐松身后之东西两京里坊
- 114 探索者的足迹
- 120 去欧罗巴看震旦图
- 125 沿革也要传承
- 129 识往古兵略于聚米图经

135 华夷交争之世的草莽英雄

说书论书

143 中国人文地理的传统

148 知闻地中海

156 也说“匆匆不暇草书”

174 由国朝到宫室再到里坊

184 子虚乌有的金刻本《旧五代史》

222 东莱考史例说

233 明刻本《广游志》

236 清后期的历史地图

270 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297 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彙辑校《草窗词》

312 《全唐诗》补遗

318 后记

念书买书

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业师黄永年先生去年过世以后，我写过几篇文章，缅怀先生，但都是回忆往事，没有涉及先生的学术贡献。这是因为自己虽然蒙先师不弃，视同及门弟子，但所学甚寡，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先生的学术见解。现在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依然无力全面阐述先生在古文献方面的造诣，只能勉为其难，简单谈谈极为粗浅的受学体会。即使如此，不得要领之处，还是在所难免，先师若是健在，必定要遭到斥责；或许只有老老实实说实在话、不做官样文章这一点，尚能因恪守师训而免吃杠杠。

学术界有很多人用古文献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古籍整理专家或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来称呼黄永年先生，但先师却一直不大喜欢这些称呼，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版本、目录等古文献知识，只是研治古代文史必备的基础，犹如欲研究某一外国的问题，则必须首先掌握其语言文字一样；了解这些基础知识，从这里入门，本是人所例行的正常途径。

黄永年先生虽然早在中学时期，就蒙受一代宗师吕思勉先生亲炙，后来又问学于顾颉刚先生等学术大师，但具体做研究，并没有专门接受某一老师的特别指点，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依赖他自己读书体悟。大凡自学文史之学的人，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较多的人流于陋略局促，另有一小部分人则因不受特定范围和路数的限制，反而较常人更为博通渊雅。黄永年先生当然属于这后一

类人。

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周绍良先生宴请先师在京中某餐馆雅聚，席间先师感叹能相与畅谈的人越来越少，绍良先生笑着说：“现在都是专家，而你老兄是通人，跟不通的人，当然没法讲话。”其实中国古代文史知识浩瀚无际，谁也没有办法一一通晓无遗，文史学界所谓“通人”，通常也只是较大多数学者多读一些基本典籍而已。靠自己摸索读书，反倒比遵循现代固定学术轨辙的人，更能博通四部群籍，这是因为这一类人更具有向学求真的性情，更不受世俗的功利所诱导，读书也就不会那么急功近利。记得周一良先生在一篇探讨清代乾嘉学术形成原因的文章中曾经谈到，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不唯世人所云朝廷政治高压所致，考据史事，实际上犹如阅读侦探小说，事实真相的诱惑力，自然会使学者乐此不疲，欲罢不能。读古人书而能泛及历朝历代各类典籍，实际上也是探究历史面貌的好奇心所致。不过，书海无涯，越是多读，越不能泛滥无所约束，真成为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想要多读书，读好书，自然而然地也就要讲求版本目录之学。我想黄永年先生能够对古文献有比较深切的了解，首先应当是出于这样的缘由。

现在学者研究问题，有许多人是基于某一体系或是按照某一理论来预先规划设计题目，但过去老一辈人读书，往往更重视“读书得间”，主张从阅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通过查阅史籍来解决问题。黄永年先生治学，始终强调以文献考据为基本研究手段，用他自己常讲的话来说，这是承自顾门的“真刀真枪”功夫。要想写好考据文章，对自己的观点做出强有力的论证，第一要义便是清楚知晓每一论证环节所需要使用的相关文献，以及各种文献可信度的高低强弱，还有其中某些文献的版本源流关系，我想这是促使黄永年先生重视了解并进而研究古文献最强大的动力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古文献学虽然可以看作是历史学或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但若是单纯就文献论文献，即只做文献研究，不管是研究版本、目录，还是研究某一类别、某一时期的文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都难以将文献研究做得很有深度，达到一定层面之后，往往都要受到限制。按照我的理解，由于只是将其视作文史研究的基本工具，黄永年先生古文献研究最大的特色、同时也是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结合具体的史事研究来分析、认识文献，始终着力于揭示文献的史料价值，或是侧重阐释古文献的构成来源以及学术史、文化史背景。

《唐史史料学》是反映黄永年先生目录学功力的一部重要著作，主要为指导隋唐史专业研究生掌握研究史料而作，初版于1989年，因深受学术界欢迎，2002年又印行新版。先师在自序中讲到，他要在这部书中，“力求把所提供史料的源流、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利用讲得清楚些”。虽然还没有见到同样的唐代史料学著述，但与同类性质的通述性中国古代史料学著述或是其他朝代的断代史料学著述相比，这部《唐史史料学》在这方面的优点确实十分突出，海内外学人对此有目共睹。可能会出乎很多人意想之外，当初先师动笔撰述该书初稿的时候，只用了短短不到20天时间。尽管正式出版时较初稿又有不少增饰，但是其基本内容特别是最有深度的两《唐书》等基本史料，在初稿中就已经定型。先师受陈寅恪先生影响，从很早起就侧重研治李唐史事，在读书过程中反复揣摩考稽各种相关文献，积累多年，到出于教学需要撰写此书的时候，犹如水到渠成，能够一挥而就。

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一书的自序当中，特别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史料学著述，在讲述史籍时，对“这本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怎样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却绝口不谈”，并且分析说：“这也难怪，因为有些编写者自己就没有读过用过这些书，哪来经验可以对人家传授呢？”多年以来，作者自己根本没有读过就大胆妄为作

导读的史科学著述，确是越来越多；不过，还有很多史科学著述，作者并非没有读书，甚至部分作者读书还相当广博、认真，但像黄永年先生这样，既能做很好的文史专题研究，同时又兼擅版本目录之学的作者，确实并不多见。

这种实际研究体会对于阐释文献史料价值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研究内容与相关文献的具体联系上，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只有深入研究历史问题才能形成的对文献的认识能力和分析方法，这甚至可以说是对问题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研究的“状态”。对于大多数单纯研究文献的学者来说，其最难以突破的障碍，实际也正在这里。

先师最为系统的文献解题性目录学著述，应当是写在《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目录学》这一部分内容。如果说《唐史史料学》一书集中体现了黄永年先生结合具体研究来论述古文献学价值这一特点的话，那么，《古文献学》四讲中讲述的目录学知识，则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出先师研治古文献的弘博畅达程度。

传统的四部典籍，若是按照现代学科来区分，内容涉及文、史、哲以至自然科学几大领域，黄永年先生兴趣广泛，对这些学科不同程度地都有所涉猎。譬如有关自然科学内容，对于一般文史学者来说，相对最为生僻，黄永年先生对相关重要著述，也都一一披览，早年还撰写过介绍古代科学发明的小书《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正因为对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才在很有限的篇幅里，提纲挈领，有条有理地讲述四部基本典籍。例如，经部书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系统阅读利用，向初学者讲述，尤易流于散乱枯燥，先师则独创一格，按照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分成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就使读者摆脱了学习目录学知识时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

涩，同时，还可以通过对这些书籍的了解，初步感悟到与这些著述相依伴的学术脉动。

自清末以来，学者研治古代文史，多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作为阅读史籍的入门指南。黄永年先生曾经撰写过一篇《编撰〈书目答问〉新本刍议》的文章，以为自《书目答问》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亟待编撰一《书目答问》新本”。先师在文中为这一“《书目答问》新本”提出6点具体设想，大意为：（1）宗旨是为治古代文史者提供文献指南。（2）应大体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适当予以增改。（3）古籍断限于清末民初，唯个别新著与古籍同一性质者，可择要收入；校注则不受时间限制。（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我国古籍、我国古代文化研究之重要成果，应择要著录。（5）新校注本、新标点本及影印本，均宜取其高水平有学术价值者，草率牟利之本概不得录入。版本介绍应注意增列宋元精善刻本之影印本。（6）执笔撰述需有通识且具专长者为之，名称不必沿用《书目答问》，或可径称《中国古籍要目》。

黄永年先生在这里特别强调执笔撰述者需要有通识且具有学术专长，所说“通识”应当包括对古文献版本目录和文史研究各领域学术状况两方面的了解，“专长”则是指对具体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我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读到手稿时，即对先生说，除了先生本人之外，现在恐怕不大容易找到具备相应条件的学者来承担此事，而先生过去撰写的目录学讲义，也就是后来印在《古文献学四讲》中的这部分《目录学》内容，除了尚未一一添注版本之外，实际上已基本实现了他有关的《书目答问》新本的设想，不妨就将其修改成为这样的“中国古籍要目”，供学术界使用。先生当时答复说，他也觉得大体就是这样，不过，若是时间和精力允许，再做些修订会更为完善；至于标注版本，对于先生来说，本来是得心应手

的事情，只是需要稍花费一点儿时间和精力而已。虽然先生去世前没有来得及对这部《目录学》各个部分都一一仔细修订，但随后应邀为高校古文献专业撰写有《史部要籍概述》和《子部要籍概述》两部书稿，近期即将出版面世，可以看作是对这部《目录学》史部和子部两部分内容的增改和扩展。我想若是适当参看这两部书籍，差不多也就可以将先生的《目录学》讲稿，视同《书目答问》新本，用作古文献入门导读了，至少眼下我们还看不到有其他更好的著述，可以起到同等作用。

不仅是目录学研究，黄永年先生在版本学方面，同样清楚体现出上述兼具通识与专长而不仅仅囿于文献本身的研究特色。先生在《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一文中附论古籍版本研究时指出，百年来在版本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通过王国维、赵万里诸位先生的研究，理清了版本的发展演变，使版本鉴别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先师同时还指出，他们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就是忽视明清刻本，特别是清代版刻，没有梳理清楚明清刻本的发展脉络。先师随后讲道：“差可告慰的是，此后对古籍版本的研究继续在推进，赵万里留下的空缺已基本得到添补。”接下来又在文中简要叙述了明清各个时期的版刻特征及其变迁缘由，并且说明，对宋金元刻本和活字本等，也在王国维、赵万里的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归纳出特征”。黄永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很负责任地清楚指出，正是由他本人，在所著《古籍版本学》一书当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阐释，亦即由他动笔添补了赵万里留下的这一重大学术空白。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卓越成绩之一。

事实上，黄永年先生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体现为添补前人留下的空白。与赵万里先生已有的研究相比，先师在探讨各个时期版刻特征的时候，更为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对雕版技术形成和演变的影响，从而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譬如在阐述宋刻本的字

体特征时，不仅指出南宋建阳书坊“都作颜体即颜真卿的字体”，而且还分析其形成原因说：“这是由于在宋代颜字最流行，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蔡襄都是学颜字出身，何况民间，加之颜字结构方整，点划分明，工匠刊刻起来也还方便，这就是建阳民间书铺所以要用颜字刻书的缘故。”不仅如此，先师还凭借自己的书法造诣，进一步深入阐述说：“颜字也有几种路子，建本用的颜字是近于颜书《多宝塔碑》的一路，因为这路字容易学，后世的书法家往往批评它有匠气，这正好适合一般人书写，适合工匠刊刻。”又如先师论述明代中期的“嘉靖本”，提出这种版刻风格的产生，基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影响，从而以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今苏州地区为中心向各地辐射扩散；而这些刻本中以家刻居多，也是缘于这类刻本原本是由苏州的文人所倡导。又如论述清代中期的仿宋精刻本，指出这类版刻的兴盛，乃是基于乾嘉学派治学讲究校勘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分析方法，也是脱离对一般历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单纯研究版本问题的人所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

黄永年先生这些研究，在中国版刻研究史上做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即上承王国维、赵万里以来的研究，基本梳理清楚了历代版刻的演变脉络，同时又跳出狭隘的版刻范畴之外，开辟了更具有历史学意义的版刻史研究路径，为中国版刻史研究，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步其后尘，继续大力拓展的主要研究方向。不过，在从事这些研究的时候，千万需要注意，和所有研究一样，新的研究着力点，必须要以对版刻史基本事实的认知为基础，这也是黄永年先生留给我们的实在经验。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中国印刷史，近几年在国际上有那么一些人热闹过一阵，但多是浮泛空谈，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见，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大多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版刻的基本史实。国内也有人追随这一风潮，放胆高谈阔论，实际上对版刻史的基本内容，却是一无所知，不过是

随便抄撮一下张秀民等人似是而非的通俗说法，再顺手添加一些时髦的词汇而随意发挥。这样的所谓研究，可以说毫无学术价值，除了作者用以自欺，也只能哄哄某些无知的西洋外行，要想欺人欺世，恐怕也并不那么容易。

先师系统论述古文献学的著述，除了上述《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古籍版本学》之外，还有《古籍整理概论》，以及与贾二强学长合著的《清代版本图录》；相关研究论文近50万字，则已经由我汇编为《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在中华书局出版，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自可取阅，无需一一叙述。

在这里我还想说明的是，基于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认识和研究，黄永年先生在观察古文献时，有着非常敏锐的直觉，有一些重要问题，他并没有展开专门的论述，只是更多地本着出自事物常规的直觉，在相关论著中简单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阅读先生的古文献著述时，对他那些独到的见解，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例如，关于《旧五代史》的原本问题，民国时人汪德渊曾经号称藏有一部金刻本，当时最著名的版本学家张元济、傅增湘等都一直相信确有其事，黄永年先生却在《唐史史料学》一书中断然贬斥说：“恐亦文人好奇，故弄狡猾以自嬉而已。”以前上学时我在课堂上听黄永年先生讲课，对这一问题将信将疑，没敢请教先生何以做出这样明确的判断，近日偶然尝试对此做了一番探索，撰写一篇小文，题作《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始相信确实应如先生所言。

又如关于中国印刷术的产生时间问题，多数学者总是倾向将其定得愈早愈好，黄永年先生却一直坚持认为，最早不应早于盛唐玄宗时期。先师在《古籍版本学》中对这一观点有说明云：“这都只是推

